《是時代辜負了他》

—— 寫在《秋白春寒》上網之前 ——

《週末談》每談都限在一千字左右。但像瞿秋白這樣多姿多彩的歷史人物，似乎不宜在這樣短小的篇幅里介紹的。瞿秋白（1899-1935）出生在一個“此時有子不如無”的破落戶。因天資與勤奮，成為一時無兩的俄文專家。他36歲即遭殺害，然而短短的一生中，竟能在中國近代史的多個重要領域里留下足跡。此外，還有五、六百萬字的寫作，包括行刑前的遺作《多餘的話》。他的悲劇，深刻地體現了自己人的不義，敵人的殘酷，和時人的冷漠。他是這個時代的孤兒，時代辜負了他的一生。

同年代人對他表示嚮往和懷念的，最著名的是丁玲和魯迅。丁玲以他和王劍虹的愛情悲劇為藍本寫了小說《韋護》；魯迅跟他會面後，手書了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”一聯相贈，並把生命的最後幾個月，全部為了籌備出版紀念秋白的《海上述林》。

我是讀了秋白臨刑前寫就的《多餘的話》開始認識他的。我不知讀了多少次，可是每次，我都有稍為不同的感受。我對他，是從同情到瞭解，再進而對他的敬佩。

他的最後遺著《多餘的話》這個書目，應視作反話，因而亦不能接受他是時代的“多餘的人”。如果是“多餘的話”，那麼為什麼那麼多人，一讀再讀呢？同樣的，能寫下這樣的一本書的，又怎能說是個“多餘的人”呢？

我相信他是個在政治上沒有野心，在文化事業上也不追求名利。他之所以在近代史上露頭面，正如他對魯迅解釋他為什麼取了

“犬耕”作筆名時所說的話：“我不是政治動物，搞政治，無力量可濟。耕田本是用牛的，狗耕田當然就耕不好了。我就是那權當充數的耕田’犬’。”他尊重魯迅，他說的一定是實話。我們這個年代的人，聽了，誰不無慨嘆呢？

1989年我到常州去採訪他的童年朋友羊牧之老先生，並參觀了剛開幕的《瞿秋白紀念館》。

那時羊老已 88歲了，很健談。他信手給我寫了幾張瞿秋白的語錄，記憶力和腕力都很健強，一点老意都没有。回來後，我在巴黎社科院的講座（2003），曾頗為詳細把秋白的史蹟談交代過。 在下一次的《週日談》我將另文介紹羊老。

羊牧之先生與我

2016年，我以他的一生，寫了《秋白春寒》這本四幕劇，並打算在國內刊行，誰想到，稿件轉到一些有關人士手裡，竟然變成一個燙手的山芋！

之前，我請秋白的後人審閱，後又蒙朋友把劇本交給一位戲劇界人士品評，認為“作品取材嚴謹、文字簡潔凝練，在當前風氣下十分難能可貴”，並得他主動推薦給瞿秋白紀念館，傳達我的願望，以紀念館名義出版，冊書又他們決定，費用則全由我承擔，出售所得款項，全歸紀念館。但很久未見答復，如泥牛入海，了無蹤跡！

最令我難過的是友人反映的那幾句話：“《秋白春寒》的事，主要問題，猜因秋白是重要政治人物，你又是法籍，國內機關，凡屬涉外之事，特別小心謹慎。他們怕引起什麼麻煩，遲遲不敢決定。”

讀後，令我無限感概，才禁不住執筆寫了這一談。

這段話，讓我想起我在小說《祭無言》裡，談到和國家關係上的處境：“我只感到像只螞蟻在一頭巨象身上爬行著，既不知道自己在哪兒，也不知道那頭巨象朝著哪個方向走，而它那厚而麻木的象皮，也絕對不會對我的存在有什麼感覺。”（見該書最後一章及封面）。

我非常敬重秋白。這個劇本是幾十年來，斷斷續續地收集材料、整理、構思而成。說費了很多心血也並不過分。這片苦心，真足不為外人道！然而以我提出的出版條件還不能接受，我很失望。難過的是連瞿秋白的紀念館的人也不敢表態支持！

秋白的悲劇的一生，是當代中國歷史的一個教訓。若說他已成過去，沒人對他感興趣，是很可悲的。若說生活在國外的人，別插手評介他的事跡，是思想狹隘，態度武斷，顯示辜負秋白的時代還沒消逝。